

论东北鼠疫大暴发对清末民初防疫卫生事业建设的内外影响

朱佩禧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1910—1911 年东北鼠疫大暴发蔓延至全国, 影响深远。医学博士伍连德回国担起了防疫大任, 在东三省总督锡良、外务大臣施肇基的鼎力支持下, 在俄国、日本等国外政府的合力防疫下, 实行“分区隔离、集中焚尸、断绝交通、寻找病源”等科学措施, 有效遏制了疫情, 并对清末民初的防疫卫生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日本借防疫之机, 加深了对中国地区的政治介入和经济渗透。

[关键词] 东北鼠疫; 肺鼠疫; 伍连德; 日本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0. 06. 014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内外史学界从“医疗社会史”“公共卫生系统的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等多元视角来考察东北鼠疫发生的原因及其对现代的启示。^[1]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利用《东方杂志》《申报》《新闻报》等未刊资料对 20 世纪初东北鼠疫暴发原因以及东三省防疫处的创建展开考察, 分析中日俄三方政府在鼠疫暴发后合作抗“疫”的过程, 深入研究其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内外影响及启示。

一、鼠疫暴发及蔓延中国的原因

鼠疫是一种比人类更古老的疾病, 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2] 在明清时代影响着中国的人口和社会发展。^[3] 1894 年(清

光绪二十年), 鼠疫曾发现于香港、云南、广东等华南地区, 19 世纪初鼠疫基本都在华南传播, 直到 1898 年腺鼠疫从华南到牛庄传播, 1899 年东北营口暴发鼠疫, 导致 1370 名中国人丧生; 1910—1911 年东北三省及全国的肺鼠疫大流行, 因死亡的人数达到 65000 人, 按当时币值, 经济上损失达一万万元而载入史册; 1917 年 12 月(民国六年)绥远和山西两省流行鼠疫, 在七个月间死亡达 16000 余人。^[4] 1920—1921 年(民国九年)东北地区第二次发现鼠疫, 由于设有专门的防疫机构, 所以死亡人数大大降低, 有 8500 人丧生, 染病范围仅限于满洲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2019 年 11 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发现多例肺鼠疫病例, 鼠疫仍是中国强制管理的甲

类传染病。^[5]

1910—1911年暴发的鼠疫源自俄国境内。据报道,1910年的9月,俄境西伯利亚的斯列涅克斯、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相继发生鼠疫。因地广人稀,政府管控严格,使疫情没有大规模蔓延。但俄国将可能染疫的中国民工驱逐出境,将鼠疫带到了中国境内。自1910年10月12日在满洲里地区发现了鼠疫病例,^[6]10月26日哈尔滨发现鼠疫病例并成为疫区,12月31日长春列车中发现鼠疫,1911年1月大连发现鼠疫,1月21日北京发现鼠疫。^[7]

东北鼠疫的暴发与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有着密切联系。^[8]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贸易带来的繁华景象令一度被视为关外蛮荒之地的东北三省,成为20世纪以来发展最迅速的地区。而随着俄国、日本势力的侵入,及其所控制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的开通,大连、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迅速发展成为跨区域的铁路、港口的中心城市,聚集了大量来自山东、河北等地“北上闯关东”的移民。到1908年,奉天接纳的移民已达500万人,满洲地区约有90万人,其中哈尔滨地区就有10万人。^[9]

铁路的开通,开启了东北地区近代城市化进程。哈尔滨作为东北交通枢纽,成为人口密集的商业城市。铁路横穿市区,将哈尔滨分成东西两部分,西边为道里或道中,东边为道外。道外的傅家甸,也称为华界;而道中设有涉外公署,即俄国租界。从地理概念上说,哈尔滨包括了铁路附属地的埠头区和新城区以及傅家甸,而中国的道署就设在傅家甸。^[10]华界的人口在俄国人获得东清铁路修筑权后急剧增加,包括大量的民工、商人和移民,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街市。尤其在1903年东清铁路正式通车后,发展更是一日千里,街巷纵横,人语喧嚣,居住了24000人。^[11]城市化进程加剧人口密集度,改变了社会系统,造成了城市两极分化,简陋和密封的住宿条件也加剧了鼠疫的流行。

东北鼠疫是环境与人相互的产物,也反映社

会经济变迁带来的生物圈的变动。人们对旱獭皮毛带来的高利润的追逐,使得人类介入鼠间鼠疫的传播链,导致了鼠疫在人与人之间暴发。东北的鼠疫源自旱獭。20世纪以前,猎人经验丰富,能够辨别旱獭是否染疫,所以不会带回得病的旱獭。然而在20世纪初,旱獭皮在毛皮制品消费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激增。^[12]捕杀、售卖旱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猎人在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往往食物不足,就吃旱獭肉。鼠疫病毒也因此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铁路成为瘟疫传播的一大途径。自1907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全国掀起了修建铁路的热潮,直至清末民初现有铁路三十四线,其中,关外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分别为俄人、日人所经营。尽管1911年正月初,俄国人在满洲里“厉禁交通”“严防巡防”,在边境地区设置防疫线,可是,惊慌不安的人们从满洲里沿着铁路沿线四散而逃,而鼠疫随逃难灾民迅速蔓延东北三省。染疫人员仍随着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南下传播鼠疫。鼠疫由满洲里传入哈尔滨,并且波及扎赉诺尔、扎兰屯、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地。作为东清铁路的枢纽——哈尔滨首当其冲成为鼠疫的疫区。尽管东清铁路公司在哈尔滨设立防疫会,每天检查,并且雇佣俄国医员负责傅家甸区的华界检疫。

二、合力战“疫”

疫情发生后,东三省原有的医疗方式陷入无效困境,因为中医应对的手段不过就是放血和针灸,但最终结果是医患同归于尽。当时俄国医生也有染症去世的。病人的症状先是发烧咳嗽,然后出现吐血,短短几日内死亡,死后皮肤呈紫红色。哈尔滨地方官厅发现疫症后,将病人送往市内,安置在由公共澡堂改造成的医院内。官方政府将病人隔离,在病死后给予适量埋葬费,除此之外对疫情束手无策,无法控制疫情向南蔓延。

1909年2月(宣统元年),锡良奉命担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总督。^[13]锡良在此次

战“疫”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由于他担起了抗“疫”的重责,相当于防疫的后勤总长和救火队长的角色。1910年10月哈尔滨暴发鼠疫并迅速蔓延至东北三省,直至1911年2月17日因“疫势渐退”“肃清东省疫象”而有“慈宫嘉许锡良懿旨”,^[14]同年3月26日据《东方杂志》“东三省疫患肃清宣布中外,以东督锡良等电奏也”。^[15]这四个月的战“疫”过程,不仅是对东北三省民众的考验,更是对锡良从政以来的最大考验。素以廉洁仁爱而著称的锡良总督在此次瘟疫面前如何指挥战“疫”?下面我们将分析锡良、施肇基、伍连德三人的互动,考察中央与地方这两个层面之间如何建立信任机制,进而合力战“疫”。

由于防疫事务属于社会救济,当时中国地方社会无力担起抗“疫”责任,这时候只有地方政府责无旁贷成为社会救济的主角。由于清末立宪运动,使得权力集中与地方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地方权力有所伸张,使得地方治理有效性增强。锡良上书清政府,考虑东北地区连接华北,他以“唇齿相依”“轻则东三省失陷,重则大清社稷飘摇”的大局角度分析鼠疫蔓延将影响京畿重地的安稳,为了避免京师乃至全国受其影响迫使摄政王(由于宣统皇帝即位时年幼,由他的父亲载沣摄政)同意廷议防疫事务,并准派专业人士前往东北协助控制疫情。清政府派出外务大臣施肇基,^[16]由于他刚从吉林省西北路道道台退任,十分熟悉东北地形并与外务部保持亲密联系,随时能与俄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施肇基在斡旋处理东北地区的俄国和日本势力之间的合作防疫事务,防疫事务上能争取日本和俄国的大力支持就有他的功劳。1910年12月21日,清政府“选派中日医生购备药料器具,由奉驰往襄助。复经外务部委中国医生伍连德、法国医生梅聂、英国医生吉陞同时前往”。^[17]施肇基力荐伍连德,终于使清政府做出决定,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为其准备护照和有关公文,并发给奉天总督、吉林巡抚、西北路分巡兵备道和陆军军医学堂。^[18]

同时,锡良在东北地区的措施宽猛相济。一方面,他奏请“出力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很快得到朝廷批准。“吉林、黑龙江两省都分别制定了有关防疫捐躯人员的抚恤金,比如医生抚恤银1万两,学生抚恤银5000两等。”^[19]另一方面,锡良重拳处理了一批官员。吉林西北路道的于兴兴“虽担任防疫活动的监督,却不热心于其职务,故令署吉林交涉使郭宗熙兼任西北路道”,吉林西南路道的李澍恩因“防疫不力”而被革职。锡良还十分注重信息的透明,及时上传下达,完全没有进行消息封锁。他要求东清铁路各州县每天用电报报告鼠疫的流行情况,“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20]锡良作为地方大吏廉洁、干练、负责,由于他政治上比较开明,其管辖的东三省是20世纪初全国范围内较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地区之一。在他的认可下,地方自治组织相继成立,《盛京时报》《奉天公报》《抚顺日报》等报刊杂志相继开办,在鼠疫防控宣传报道中也担当了重要作用。此外关内的一些大报,如《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也都直接参与了对此次东北鼠疫的跟踪报道。总之,纸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使得此次鼠疫的防控过程比以往更为透明,减小了灾难性影响的范围。从中也可发现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宣传科学防疫知识、提倡新的文明生活方式以及建立新公共卫生制度的理论构想等诸多方面。

可是对于管理者来说,防疫还有一大阻力来自普通民众,当时的民众普遍缺乏现代医学常识。世界上普遍认为中国人不讲卫生,缺乏公共卫生常识,所以才会染病独多。1911年奉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月14日,一列载着关内劳工的列车离开奉天前往山海关。可是不久之后,列车上就发现了两名乘客死于鼠疫。因为发现了感染者,第二天,这列火车不得不原路返回奉天,乘客们被安置在车站附近的客栈里。因为需要采取隔离措施,客栈周围设置了警戒。八天后一百多名劳工暴动逃离了客栈,而一周后奉天的

死亡人数突然暴增……当时奉天隔离规定“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21]民众对抗疫事业的认识 and 配合,也是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的反映。可见,伍连德的“科学防疫”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支持系统基础上的,若没有这个前置条件,再科学的防疫措施也无法见效。

正是锡良和施肇基的信任和全力支持,使得防疫总医官伍连德的全部防疫战术思想得以在东三省的财政、军政、民政等方面畅通无阻。1910年12月21日伍连德带着他的助手林家瑞启程,经山海关、长春,12月24日到达哈尔滨,深入疫区开展防治工作。他“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22]

伍连德采取以下四个步骤:分区隔离、集中焚尸、断绝交通、寻找病源等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由于伍连德解剖疫尸发现此次鼠疫是肺鼠疫,它能够通过飞沫等接触传播,感染肺部等重要器官,所以分区隔离的方案是当时最适合的。

首先,伍连德将傅家甸划分成4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备两名助理、4个医学生以及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就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用生硫磺和石炭酸在病人居住过的房屋内消毒。为了顺利执行分区防疫计划,锡良专门从长春调来了1160名士兵组成步兵团,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代表区颜色(白、红、黄、蓝)的证章,并且活动范围限制在本区内,如果想要去其他区域需要申请特别准许证。即使是区内的军人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允许随意走动。正在城市外围承担封锁任务的600名警察被撤换下来,在接受防疫培训后,被分配到防疫局医生直接控制的4个分区和防疫站。伍连德则评价说,这支队伍后来被证明“有巨大的价值”。

伍连德向东清铁路公司借了120节火车车

厢,用做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由医生每日诊察,只有连续7天体温正常才能解除隔离。在后来的国际鼠疫大会上,他还将此作为最重要的经验:“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隔离方式,在铁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来。”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轻重,将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在各病院中设置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连德首创的,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这也足以证明伍连德的能力和远见。

其次,集中焚烧疫尸,更是需要社会民众的支持,因为当时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念还没有完全认同火葬。但为了防疫需要,1911年1月28日伍连德向清廷上书请求准许火葬,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也联名向锡良陈情,希望批准火葬。48小时后,即1月30日,他们获电报批准。正是在疫病面前,政府和社会商民都全力支持伍连德的火葬举措,才避免了疫情的扩散。^[23]

随后,道里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伍连德考察中俄边境后完成的《早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1913年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1923年6月2日,伍连德带着东三省防疫处专家伯力士、关任民、扎博罗特内等人再次赴中俄边境考察,捕获到了染疫以及病死的早獭,以此为实验动物及标本进行了“早獭疫苗吸入性实验”。“这个实验结果非常有价值,它证明了早獭之间可以不经过跳蚤这个中间媒介,而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反过来也证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

正是伍连德遵循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东北防疫过程经过迅速查清疫源、截断传播途径、救治危重人群这三个阶段,最终得以有效防控。其中,截断传播途径这一阶段在近代中国却是困难重重。因为东北地区的铁路、港口等主要交通控制权掌握在外国列强手中。如果实施“隔绝交

通”，除了清政府的决断之外，还需要与日本、俄国的合作才能实现。

三、中日俄三方合作防疫事务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北三省是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复杂的地缘政治使得东北三省成为日俄等列强的势力范围。俄国制定了蚕食亚洲的“远东政策”，而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国的侵略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主张西伯利亚大铁路干线（东清铁路）应通过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并取得了东清铁路北满干线和南满干线的修筑权。东清铁路耗资巨大，俄国为铁路的修建付出高昂的费用，在1898—1901年间共拨款25216.7万卢布，^[24]聘请了6万名左右中国劳工。^[25]中日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战败，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开始介入中国东北地区。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东清铁路的长春至大连路段，即获得南满铁路的租借权，为了管理南满铁路，在1906年11月26日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部设在东京，并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负责军、民二政及南满铁路附属地的防卫事务，日本势力日益渗透东三省。^[26]因此，对俄国和日本而言，出发点是保障东北地区铁路的权益实行。中日俄三方围绕交通隔绝方面在防疫事务上开展了合作，清政府在与日本和俄国的合作中开始创建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事业。

中国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自开通以来半个多世纪，检疫权一直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27]1907年日俄的第一次协商，划北满、外蒙古为俄国，南满、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12年日俄的第三次协商，划内蒙古东部属日本，西部属俄国的势力范围。满洲里、哈尔滨是俄国势力范围，而长春、奉天（沈阳）、营口等地主要是日本势力范围。^[28]伍连德自述“1910年12月间东省肺病流行猖獗，本地官僚及汉庸庸流均以束手难防此种急性传染之流毒。吾国苟无适宜预防之策，又恐日、俄派遣医员及陆军呈其野心，而越俎

代庖。”^[29]可见，鼠疫一旦暴发，日俄双方纷纷想插派专家及出兵接管，并企图趁火打劫控制东北。

清政府一开始防疫不力，除了将病人隔离之外并未有具体防治办法，以致疫情不断向南蔓延。据统计，1910年10月至11月，满洲里、哈尔滨相继暴发肺鼠疫，致死率特别高，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北三省、京津、山东、汉口，扩散到长江浦口的65县市。染疫死亡人数五万余人，财产损失1亿余美元。据统计，至1911年4月，各省及各地区报道的染疫死亡人数共52462人，其中黑龙江15295人，吉林27467人，奉天5259人，旅顺、大连76人，经奉天—天津—北京1693人，经北京—汉口173人，北京经直隶、山东至长江浦口928人，山东1562人。^[30]严重的疫情令中央和地方官吏开始重视防疫，并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比如聘请外国医生直接参与防疫工作等，这是以往清政府所没有的举措。

俄国人在满洲里发现首例鼠疫，在其势力范围内执行了严苛的隔离。他们用兵驱逐华人，焚烧华人的市场。只要街道店铺内有传染病的人，无论是否患了鼠疫，俄国人马上就会派人封门闭户，将人赶到火车站外铁路线上，将华人圈入“瓦罐车”内，不许他们出来。然而隔离政策并没有达到实际效果。华人和俄国人的大量死亡，15日之间约达500名，其中1911年10月20日以来满洲里的华人自隔离以来丧命者300多人，此后数量不断增加。^[31]“从圣彼得堡报道，哈尔滨城内每天死亡150人，染疫尸体有的被狗啃咬，有的被扔进黑龙江，这一幕像极了欧洲中世纪。”^[32]这令俄国人极为恐慌，让人们想起了欧洲的“黑死病”。

10月26日俄国在哈尔滨执行了更严厉的检疫手段，可是仍然维持铁路运输。当时俄国提议，在铁路线驻扎俄兵，凡在哈尔滨道里的华人往来均须检验，并由俄国东清民事机关发放传单。俄国人对进出东北的中国人进行残酷的检疫，一周内因俄国人阻止而返回的旅客，每天高

达数百人。而且有传言,一旦进入东北,几乎有不能生还的危险。俄国先后在满洲里和沈阳将万余名中国人驱逐出境,用火车押送到长春,但控制长春的日本人不允许这些中国人入境,导致不少人未感染鼠疫却冻死饿死。这是十分痛心的事件。俄国的检疫手段是对中国人采取区别和严苛隔离对策,引起了中国商民的抗议。

由上可知,虽然首先发现鼠疫的俄国政府先开展了隔离对策,可是由于没有隔绝交通反而使得鼠疫在东北地区蔓延流行,形成瘟疫。相反地,日本方面则更多地积极地参与东北防疫事务,获得了中国方面的信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则谓“关东预防鼠疫事业须信任日本官吏,使两国共同筹商预防办法,现拟自奉天以南断绝交通”。^[33]真正完全实施“隔绝交通”政策,离不开日俄和清政府的通力合作。

1911年1月11日清政府在长春设检疫所。锡良认为疫情随着火车在铁路沿线扩散,因此他发急电吁请朝廷进行交通管控:“(应)于火车经过大站添设病院、检疫所,凡乘火车由哈(尔滨)赴长(春)、由长(春)赴奉(今沈阳)之商民,节节截留,一起送所检验,过七日后方准放行。”^[34]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1月13日清政府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任何经过山海关的旅客都要留置5天观察,即便是当时的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京,也在山海关停留了5天。^[35]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于1月19日采取检疫办法、部分停票。也许是出于对疫情蔓延的恐惧,清政府对交通的控制也不断升级。1月21日清政府下令“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36]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除隔绝交通之外,日本和俄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财政上、物资上、人员上合力帮助清政府渡过难关。1911年1月,日本政府当天提出“将满洲防疫费一百万元追加预算”议案并通过。^[37]满洲瘟疫,俄国政府拿出400万卢布作为东北三省防“疫”经费,其中250万卢布用于海参崴。^[38]

1911年2月,关东都督大岛义昌会见东三省都督锡良,“谓当实行扑灭鼠疫之策处置结局定设清日两国防疫委员大岛都督电请日本政府派遣赤十字社(红十字会)、担架队至满洲防疫本部可。”^[39]然而,随着日本全面介入防疫事务,开始有政治干涉的现象,反映了其殖民的野心。“日本藉词奉天防疫不善,彼将派人逐户检查,锡督严阻不听,已传知居民闭门不纳。”^[40]日本引进西方医学,将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强制、积极地导入中国,包括在满洲应用血清疫苗等防疫法,目的是全面提升卫生基础,从而彰显现代化的模范地区,以当地人民健康标示日本统治下的文明。^[41]日本通过卫生事业拓展策略和治理技术,实际上是为了在满洲地区扩张其国家势力,通过掌控卫生事业近代化进程来实现其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的野心。所以,其积极合作和参与防疫的背后也带有帝国扩张和权力象征的面向。

施肇基1910年12月底提出召开国际防疫会议,遍邀各国专家,来华讨论扑灭办法。1911年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候,多国增援的医生到达,减轻了伍连德的工作压力,他们几次开会商定了一系列周密的防疫方案。中日先后共召开6次会议,其中《长春中日隔断交通之章程》就是中日防疫合作的成果之一。民政、交涉两司会同日本防疫人员成立了“中日防疫会”,多次开会讨论东北南部防疫措施。3月22日,施肇基到达奉天(沈阳),他担任国际防疫会议的最高委员,专门主持非科学方面的事务,清政府拿出10万银元筹备此次会议。

1911年4月3日至28日,伍连德在奉天主持召开万国鼠疫大会,这是首次由我国主办的国际医学会议,会上伍连德被选为大会主席。^[42]1912年,东三省防疫处创立,伍连德担任总办兼总医官。在奉天设置了奉天全省防疫总局,在北京设置了北京临时防疫事务局,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进行了鼠疫防治等工作,在闸北区成立了卫生局和防疫处等,各地纷纷成立防疫组织,^[43]这些机构与商会、自治会相互协作,进行

了鼠疫的防治。

全国各级政府沿用东北防疫措施,比如上海“设立防疫所和消毒所,将有疫地段的铺户和居民暂行迁入调养进行隔离,由防疫所提供衣食,其房屋用白铁皮围筑并用铁丝网搜捕老鼠并药物进行清洁,派出之人役并接种疫苗进行预防,有疫之人送中国医院医治”,陕西进行全省扫除污渍等。^[44]

清政府上下积极应对,采用西方医学的救治体系,实施了现代化的防疫措施,尽力创建近代公共卫生事业,最终控制了疫情蔓延,促进了防疫体系的近代化。此后中国虽然暴发了几次鼠疫,不过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流行瘟疫,这与政府和社会共同创建的防疫体系有关。

由于公共卫生的重心在于未知,公共卫生备战于平时,这就需提高本国卫生教育、卫生行为甚至是卫生文化、卫生体制的近代化。公共卫生组织的创建,需要政府行政和专业人士来维持运转。伍连德后来担任首届中华医学会会长,他四处奔走,不断向政府呼吁提高民众公共卫生安全觉悟和重视医学教育。1912年外务部在哈尔滨成立满洲防疫事务所。民国时期内务部又设立中央防疫处。防疫的组织机构下放到县、厅一级。哈尔滨防疫组织为东北三省防疫机构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1911年在哈尔滨成立的东北防疫处,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的防疫机构。随后,地方当局分别在哈尔滨、牛庄、安康等8处设防疫医院及检疫处。1919年中央防疫处在北京成立,而所效仿的就是1910—1911年以东北肺鼠疫流行为契机,在哈尔滨建立由伍连德掌管的东北防疫处。^[45]

伍连德认为,光靠少数医务工作人员不行,还要培养一批医务人员。1926年,伍连德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为当地培养医学人才。此外,在长春、沈阳、上海等各地兴建医院和医学院,防患未然。得益于更多医学院的成立,培养了更多专业医学人才,使得清末防疫卫生事业真正得以建设起来。

伍连德提出的在北京建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议被采纳,即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医院。1926年10月到1928年东北第二次发生鼠疫,东北地区建立的七所防疫医院开展及时救治,使得68770人得到治疗出院。^[46]这充分显示了近代防疫体系建立的有效性。

四、结 语

1910年东北地区肺鼠疫的暴发及其蔓延,与当地社会经济变迁有着密切联系。城市的繁荣,移民的涌入,经济发展的背面是中国地方公共卫生事业和全国公共卫生制度的空白,这也成为遏制近代中国发展的内部短板。疫情考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的是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同心抗疫。

鼠疫暴发以来,中央和地方,清政府和日本、俄国等帝国主义之间合力防疫,特别是各级政府在此次东北鼠疫的防治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开始建立的标志。当时东三省取得了良好效果,基本措施如成立专门的防疫处、隔离患者、烧埋尸体等,总结成防疫经验被其他地区采用,防治鼠疫也成为当时一些大城市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特别是外务部成立的中央防疫处直接起到了很好的行政指导作用。围绕鼠疫的治疗和处置过程,地方防疫所依次成立,使得中央与地方围绕着防疫问题加强了双方的互动与联系,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组织通过自治力量逐渐扩大了自身实力。

对于清政府来说,医疗体系同样受到鼠疫带来的冲击,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方向,即重视西医的治疗,建立近代公共卫生防疫制度。清末民初,随着清朝灭亡,民国初创,政治权力变化影响着公共卫生制度的近代化,防疫事业在地方上因为权力分散而受到影响。正如伍连德在山西防疫时候,指出中央式微,地方政出多门,一旦发生瘟疫,地区防疫事务常力不从心,所以他提出“经济无阻,则政易行;取外之长,补我之短;择其善者而从之;尚科学之研究,根本之追求;扫除陋俗

恶习,戒绝奢华之风;求实际,尚恭谨;国由此强,家从而富。”^[47]

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开始重视卫生制度化 and 法规化。1930年代国民政府在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同时,接收了通商口岸的检疫机构,其中伍连德就担任管理处处长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自此中国人开始掌管检疫主权。根据1926年《万国卫生公约》制定中国的《检疫章程》。同时通过卫生教育培养大量的公共卫生教育的人才。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采纳伍连德等医学博士的条陈,交通部分别指示全国官有铁路严厉执行各种卫生规则,教育部批准各校适用卫生的教科书,这些都是新的变化。还有,重视对检疫人才的培养,当时在国外学医十余年的医学专家刘瑞恒、金宝善等回国报效,为中国医学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社会媒体不断加强科学常识的普及。在鼠疫的防治过程中,民众和国际社会给予了大量支持和帮助,使得中国民众心态也发生了变化。鼠疫导致产生民众恐慌心理,开始重视日常卫生健康的习惯,中国在文明道路上向前进了一步,这为中央政府建立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创造了心理条件。1931年至1932年,作为检疫管理处领导的伍连德和高级检疫医官进行了17次学术演讲,并通过《申报》《新闻报》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报道,比如“传染病之处理”“传染病之要点”等。从长远来看,人民对瘟疫以及瘟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对人与生存环境的认识更深了一层。

此外,公共卫生制度的近代化,体现在国际合作。清政府召开万国鼠疫大会,这是中西相互合作的结果。虽然合作背后仍有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卫生行政来攫取更多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的事实,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性质。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张势力,不仅表现在对防疫事务的干预和介入的野心,而且还表现在日军1932年占领哈尔滨,东三省防疫处被日军控制。在失去主权的情况下,卫生行

政权也被日方所夺取,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得以收回。

注释:

[1]1990年至今中外学界围绕鼠疫问题发表了千余篇论文,专著也不少。其中,[美]班凯乐(Carol Benedict)从历史、地理和传染学的角度研究清代中国鼠疫问题,考察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日本学者饭岛涉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和统计调查资料,以卫生的制度化为中心线索,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鼠疫展开实证研究;曹树基、李玉尚则分别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战争与平时时期)、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鼠疫流行史。

[2]鼠疫(英文名为Pest,Pestis,日文名为ペスト,中文翻译“百斯笃”),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三种,其中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是由呼吸道飞沫传染的病菌,在2—3天潜伏期后就会暴发,如不及时治疗,病人死亡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曾在14世纪欧洲横行,称为“黑死病”。19世纪后半叶在世界流行,全球暴发的鼠疫疫情一度令人类陷入恐慌之中。

[3]Wu,L.T.,Chun,J.W.H.,Pollitzer,R.,"Plague in Manchuria",*The Journal of Hygie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21,No.3,1923,pp.307-358.

[4]Wu Lien-Teh,M.D.,B.Ch.Cntab.,"Prevention of Plague In Northern Manchuria",*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1,No.3567(May 18,1929),p.914.

[5]"2019年鼠疫疫情",<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9%E5%B9%B4%E9%BC%A0%E7%96%AB%E7%96%AB%E6%83%85/24142204?fr=aladdin>,2019年11月12日。

[6]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满洲里置牐滨府,民国元年府废,九年改置县,属呼伦道。县距省治(齐齐哈尔)西北一千二百八十里,地濒牐胸河,亦称满洲里。载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4-75页。

[7]《鼠疫袭来(上)》,《满洲日日新闻》1911年2月2日。

[8]胡成:《现代性经济扩张与烈性传染病的跨区域流行——上海、东北暴发的鼠疫、霍乱为中心的观察(1902—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2006年3月,第91-129页。

[9]曹锦清:《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1-499页。

[10]傅家甸又名傅家店,因为滨江厅知事嫌“店”字小气,遂改为“甸”。因山东来的傅宝山、傅宝善兄弟在此开设了第一家大车店,为往来的车马提供方便,挂马掌、修车,兼卖饮食杂货等而得名。

[11]伍连德:《录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空书》,《中西医学报》第10卷第5期(1929年),第69-75页。

[12]1907—1908年,旱獭皮经过加工后受到了欧洲市场青

昧,并直接销往伦敦和莱比锡的皮毛市场,皮毛价格遂由以往每张20戈比(相当于0.12美元)上升到1910年的1卢布20戈比(相当于0.72美元)或更高。请参见Wu Lien-Teh ed.,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Session XI, pp. 217-218。

[13]锡良(1853—1917年),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晚清名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积极推行“新政”。宣统元年(1909年)2月,奉命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

[14]《慈宫嘉许锡良懿旨》,《新闻报》1911年2月25日。

[15]《中国大事记:宣统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东三省疫患肃清宣布中外》,《东方杂志》1911年第3期,第8页。

[16]施肇基(1877—1958),字植之,生于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1888年于上海圣约翰书院肄业,1893年随出使美日秘国大臣杨儒赴美,1897年随出使美日大臣伍廷芳赴美,康奈尔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1908年任哈尔滨滨江道尹。1909年9月,滨江关道升级为吉林省西北路道分巡兵备道(简称西北路道),施肇基为首任道员,加参领衔,兼滨江关监督。1909年在外部交涉使公署(相当于外交部)办事,担任外部左丞,相当于外务大臣。

[17]《政府议定北方销疫办法》,《申报》1910年1月2日。

[18]伍连德(1879—1960),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出生于马来西亚檳榔嶼。医学博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

[19]《专电》,《申报》1911年2月23日;《会奏核拟防疫员医恤典银电》,《盛京时报》1911年2月20日;《吏部议奏防疫恤典拟请改照殁于王事定例办理折》,《盛京时报》1911年2月19日;《奏核给防疫员医恤银电》,《盛京时报》1911年4月7日;《奏黑龙江防疫会副议长染疫捐躯请给恤典折》,《盛京时报》1911年5月11日。

[20]《东省防疫记》,《申报》1911年2月10日。

[21]《隔离所之戒严》,《盛京时报》1911年1月19日。

[22]伍连德:《伍连德传》,徐民谋译,新加坡:南洋学会,1960年,第71-72页。

[23]《火葬场工程告竣》,《盛京时报》1911年2月19日。

[24]谭桂恋:《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1896—1917):俄国在华势力的发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6年,第153页。

[25][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08页。

[26]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后,将战时所修改的窄轨轨距再更改为标准轨距。该公司后又获得了安奉铁路(安东至奉天)、抚顺铁路(奉天至抚顺)、牛庄铁路(大石桥至营口)的路权,其铁路从奉天再向南偏东延伸,直达中、朝边境的安东,与朝鲜半岛的铁路系统连接起来。从1906年开始,日本在东北境内陆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四大机构,开始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交通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

渗透和控制。关东厅原为关东总督府。1905年10月18日,日本政府任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为关东总督。10月31日,关东总督府设于辽阳,次年5月迁至旅顺,成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最高权力机关,隶属日本外务省。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满铁路和旧中东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

[27]刘岸冰、何兰萍:《近代上海海港检疫的历史考察》,《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5卷第1期,第21页。

[28]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东京:原书房,1965年,第280、369页。

[29][47]伍连德:《伍连德自传》(附录),《中西医学报》第10卷第5期(1929年),第71、75页。

[30]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a Physician*,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LTD, 1959, p. 33.

[31]《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12期,第378-379页。

[32]《北华捷报》1911年1月16日,“Plague in Manchuria”, *North-China Daily News*, Peking, Jan. 17. 1911.

[33]《新闻报》1911年1月24日。

[34]《本馆专电》,《新闻报》1911年2月6日,第一张第二页第5版。

[35]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03页。

[36]《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7,1911年(宣统三年),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0册,第841页。

[37]《协和报》1911年1月17日。

[38]《新闻》,《北华捷报》1911年7月14日,第7版。

[39]《本馆专电》,《新闻报》1911年2月15日,第一张第二页第7版。

[40]《本馆专电》,《新闻报》1911年2月22日,第一张第二页第5版。

[41][43][45][日]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62-164、133、176页。

[42]万国鼠疫大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主要是针对当时在东北流行的肺鼠疫的医学研究及其治疗作为课题,参加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匈牙利、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墨西哥、荷兰、俄罗斯、日本(北里柴三郎等)以及中国(伍连德等)。

[44]《沪道电禀防疫之成效》,《新闻报》1911年9月1日,栏目“沪事谈屑”;《陕西财政旬报》1933年5月下旬,第11-13页。

[46]Wu Lien-Teh, “Prevention of Plague In Northern Manchuria”,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1, No. 3567 (May 18, 1929), p. 914. Reports of the 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1927-1928. M. D., B. ch. Cntab. Volvi, December, 1928.

[责任编辑:李本红]